

桂冠社會學叢書 25

丁庭宇博士 / 主編

勞工運動

理查·海曼原著 馬康莊譯

丁庭宇博士 主編・桂冠社會學叢書②⑤

勞工運動

理查・海曼原著 馬康莊譯

桂冠社會學叢書 25

勞工運動

原 著／理查·海曼

譯 者／馬康莊

出 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賴阿勝

地 址／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傳(FAX)／886 2 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印 刷／東遠印刷廠

初版一刷／1988年9月30日（印數：1～2000）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調換■

定 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桂冠社會學叢書序

社會學是一門以科學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就廣義而言，社會學幾乎是無所不包，祇要是和人類社會與行為相關問題，都可以列為社會學家研究及關心的對象。從狹義的觀點來說，社會學自廿世紀中期以降，基本上也已開展出研究的主體方向。現代社會學家們側重的人類社會現象，大致包括：文化、社會化、社會互助、團體、組織、階層化、階級、社會流動、社區、種族、不公平、偏差行為、集體行為、婚姻、家庭、教育、宗教、政治權力、經濟秩序、工作、休閒、人口都市化、社會變遷、環境、青少年問題等等。至於社會學研究的成果，更日益在社會與學術的各個領域中落實，在文化與生活的各個層面中發揮效用。

如果從西方社會學發展史的角度，回顧社會學形成的過程，我們首先就必須強調，由十九世紀至廿世紀初期，影響早期社會學建立至鉅的五大社會學家，也就是孔德（1798-1857）、史賓塞（1820-1903）、馬克思（1818-1883）、涂爾幹（1858-1917）和韋伯（1864-1920）。孔德是最早發明「社會學」一詞的社會學之父，他主張在觀察及實驗的基礎上以理性及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史賓塞則以生物學研究的發現，比擬人類社會的現象，並採

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解釋社會變遷及發展。馬克斯的貢獻是根據衝突的觀點，來分析社會演進的原因。而涂爾幹不僅在研究社會秩序的問題上成就斐然，他的不朽名著《自殺論》，更在研究方法及問題取材等方面成為經典性的範例。最後，韋伯無疑是對現代社會學影響最鉅的社會學家，他以為必須從個人行動背後的動機著手，才能瞭解人類社會中如資本主義及宗教所以存在的原因。這五位古典社會學家，不唯奠定了社會學發展的基礎，他們的思想更幾乎涵蓋了當前社會學各大支派的取向。

再從八十年代的發展來看，社會學仍然是以功能學派〔如派深思及墨頓 (Talcott Parsons & Robert K. Merton)〕、衝突學派〔如達倫道夫及寇舍 (R. Dahrendorf & L. A. Coser)〕、交換學派〔如何門斯、布勞及愛默森 (G. C. Homans, P.M. Blau, and R. M. Emerson)〕及互動學派〔如布魯默 (H. Blumer)〕等四大學派為主。此外，社會學界還出現一些相當突出的學派，如現象學 (phenomenology)、俗民方法學 (ethnomethodology)、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世界體系理論 (world system theory)、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辯證理論 (dialectical theory)、綜合衝突理論 (synthetic conflict theory)、行為社會學 (behavioral sociology)、行動理論 (action theory)、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系統理論 (systems theory)、巨視結構主義 (macrostructural theory) 及社會生物學 (sociobiology) 等等。新興的社會學理論，近年來雖有百家爭鳴的現象，但距理想中能統攝繁複社會現象，而放諸四海皆準的社會學理論，還有一段距離。也因此默頓所提出的中程理論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對現階段的社會學家來說，倒是十分貼切而符合實際的論點。

西方社會學的發展，有高潮也有低潮，有和諧的一面也有衝突的一面，但是社會學愈來愈受社會大眾的重視，則是不爭的事實，以美國社會學界為例，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六〇年代初期迄七〇年代初期，美國雖然於戰後晉升世界第一強國，但同時在美國這個高度工業化而富裕的社會中，也逐漸顯露以往未為多數人所重視的一些問題，如在嬰兒潮下騷動的青年、黑人、都市、貧窮、男女平等、老人、犯罪等問題。由於這些問題來勢兇猛，使得以研究這些問題為職志的社會學家，聲望大為上昇，社會學教育也因此得到相當程度的擴展。在歐洲各地區，社會學的發展更尤甚於美國，其受學界及一般人的重視，更是在美國之上，也使得歐陸的社會學迭有創新，在理論的建構與發展上，一日千里。

不過整個社會學界本身，仍存在許多多年的老爭執。譬如，社會學家到底應不應該以價值中立（value-free）的態度，來進行社會學的研究。又如，在理論取向的社會學研究與經驗調查取向的社會學研究之間，也引起許多社會學家不同的意見。此外，採取巨視或微視理論觀的社會學家，在基本的哲學觀上也可能有很大的差異。但是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無損於社會學做為一門現代社會科學的合法性，反而更使社會學本身的發展，具有多元且富彈性的特質。或許這種異質性，正是未來激發社會學進一步朝向更完美境界發展的原動力。

反觀中國社會學研究工作的發展，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它的興與衰事實上都與中國近代史息息相關。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大時期。早期（1947年以前）社會學在中國雖然是一門嶄新的學科，但是由於參與的社會學工作者，頗多活動力強而又勤於治學的年輕學者，因此對當時的社會及政治風氣，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大陸淪陷後的社會學界，因為受到中共政治

的迫害及干擾均甚於其他社會科學，直到一九七八年費孝通氏復出之前，大體上是一片空白而一無所成。後期（1949年以後）則是以臺灣地區的社會學發展為主體。由於大陸來臺的社會學者，中年一代出現了青黃不接的情況，因此一直到七〇年代中期，在年輕一輩受過西方現代社會學教育的留學生大批回國以前，幾乎全仰仗老一輩的社會學家如龍冠海及楊懋春等諸先生的領導，才能與其他社會科學一爭長短。

無可諱言，社會學在臺灣仍舊是處於起步的階段。雖然臺灣大學及東海大學在七〇年代早期克服了種種困難成立碩士班，的確具有擴大本土人才培育的功能，但是任何社會科學欲在自己的土地上紮根、成長甚至結果，都必須以博士級人才的教育，做為根本發展的標的。否則長期依靠外國訓練的社會學家，其負面的影響是有識者難以否認的。但是，社會學博士班不僅應追求成立，更應以建立實質教育內容為最終目標；以使畢業生遊學中外任何一個角落，都能不愧不懼、卓然自立，不但能從事獨立研究教學工作，並能自成一家之言。目前國內社會學教育固然仍多值得改進之處，但從創新的角度來看，東海大學碩士班的成立，實屬我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具有關鍵意義的里程碑。

三十年來，社會學家在我們社會中不祇扮演教學的角色，在研究社會問題及分析社會現象上，也卓有貢獻。由於近年來社會變遷迅速，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而政府與民衆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又多因欠缺經驗與成例，往往束手無策，使得社會大眾對社會學家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所能提供的服務，抱有殷切的期望。我們覺得社會學家對轉型中的臺灣社會，應該而且必然會擔當一份重要的職責。社會學的知識不僅可以幫助關心這個社會變遷趨勢的知識份子，去瞭解社會演進的來龍去脈，更能使

熱心的知識份子明瞭，在當前千變萬化的現代社會中，個人立身處事之道，進而具有掌握與預測未來社會發展及變遷的走向，而不致於淪落為寂寞的羣衆中一個孤零而渺小的個體。

平實的說，社會學在臺灣受到比較廣泛的重視，還是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的事。近十年來，臺灣地區逐漸由初期的開發中國家，躋身後期開發中國家的富裕社會。但是由於社會經濟變遷過於迅速，社會失調或適應不良的現象，可以說比比皆是。也因此社會學知識在解釋、預測及控制種種社會現象或問題的能力方面，更備受關心社會的國人所重視。做為從事社會研究的工作者之一，推廣與介紹國內社會學研究的成果，實為我們亟願努力的方向。

近幾年，隨著新一代社會學工作者的出現，臺灣的社會學界隱然已邁向另一個嶄新的境界。但是環顧目前國內已出版的社會學書籍，或為純教科書性質，一般人閱讀不易；或為早期經典著作的翻譯，就推廣民衆對社會學知識的瞭解而言，實際上效果並不顯著。我們相信社會學知識，不僅可做為學術研析探討的工具或未來發展的目標，對大多數人而言，社會學在日常生活及瞭解整個社會之存在與運作過程等各方面，都應該是具有正面功能的。因此，當桂冠圖書公司重提數年前的譯書舊案時，經過討論，我們一致同意有長期編輯一系列社會學叢書的必要。

由於社會學所包含的內容甚為廣泛，短期內要觸及所有社會學各領域，在現有條件的限制下，還有相當的困難。因此基本上我們不排斥任何社會學的專題，也不限定翻譯或著述的形式。在叢書的選擇標準上，我們將遵循下列三個原則，以便在衆多社會學書籍中，擇定適當的優良書籍出版，貢獻給學界和國人：

一、以介紹社會學基本知識，而具有廣泛、易讀內容者，優

先選列。

二、凡與我們社會現實問題相關的社會學專業著作，能對問題深入分析提供新知者，都在選輯之列。

三、廣泛討論最新社會發展趨勢，增進讀者對社會學新知識的吸收者。

長期編輯一系列的社會學叢書，並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我們期望學界先進和朋友，以及社會各界人士，都能對這套社會學叢書，提供未來改進的建議，共同來推介社會學的專業知識，使我們的努力能對整個社會產生更美好、更深遠、也更令人興奮的成果。

丁庭宇 誌於閉思居

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

原三版序

本書寫於一九七一年酷夏，以極緊湊的兩個星期完成。工業的騷亂已超越國界，似乎已成爲廣泛社會危機之一部分；我嘗試去掌握且使這種動亂易於理解。五年後，當我準備出第二版時，工業鬥爭的模式已有重大的改變，但其層次依然不變。很明顯地，英國工業關係的本質今天已完全轉變了，而且這種改變所反映出的是在罷工活動上的縮小。同樣地，在過去十年間，社會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都有極大的變化。

比起一九七七年出第二版時更顯著的是，今天如果我要完全重寫此書的話，將會是一項完全重建的工作。例如：我將會視罷工爲日常工作關係上的順應與衝突的例行過程中之一部分。我也會嘗試爲衝突的概念，作一更完整的理論分析，而且將更關注於罷工爲何很少發生；並將英國的經驗與外國的模式連結在一起。但這將使本書成爲一本完全不同的書。然而我仍看得出這本書所保有之價值，而且如果銷售量代表某種指標的話，很多人都會同意我的說法。

因而這本修訂版仍跟隨第二版相同的基本策略。除了列入最近的統計表及評論外，主要內容並無重大改變。如同過去一樣，讀者可衡量一下我的評估（有時是預測），能否經得起時間的考

驗。爲了使各項說明及評論合乎時代潮流，我增補了一章，比一九七七年版的附錄範圍更廣。同時我又簡略地回溯到多項在本書所提出的（或在某些情況下被疏忽的）理論及詮釋。我也再次修改了進一步閱讀的指南。

理查·海曼

於一九八四年一月

張 序

民主國家的一個標幟，就是有組織的勞工運動，能獨立於政府與雇主之外而發展。回顧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發展的主要脈絡之一，可說是勞工運動的蓄勢待發了。展望未來，勞工運動更代表了最重要的社會力量，它勢必將導引台灣社會的走向。

勞資爭議層出不窮會面臨許多棘手的問題，爲了理解勞工運動的來龍去脈，實有必要參考國外勞工運動的理論與研究，以之作爲處理的借鏡。此外，國內的勞工運動，往往面臨有行動而無方向、有實踐而無理論的困境。有鑒於此，有關勞工運動著作的推廣與譯介，實有迫切的需要。

馬康莊先生翻譯的《勞工運動》，是英國學者海曼的名著，在國際學術界中早已享譽多年，當他告訴我已譯畢此書，我心中竊以爲實是我國勞工之福，本書應可釐清國人對勞工運動的許多誤解，並建立正確的觀念。

馬先生現就讀於台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我認識他已十多年了，十幾年前從他就讀大學時代開始，他就持續表現出對學術研究的熱忱與對社會的關懷。在出版的前夕，他要求我寫幾句話，我個人感覺相當欣慰。

張 曉 春

於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一九八七、七、十七

當前我國勞資關係與 工黨現階段的走向（代譯序）

一九八七年是臺灣勞資關係轉變的關鍵時刻，事實上這種轉變在一九八六年底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就已現出端倪，不但四分之三的勞工團體選民改投區域候選人，勞工也捨棄了全國總工會理事長現任立法委員陳錫淇與省總工會理事長彭光政。有鑒於大陸工潮的教訓，必須防止工廠再度成為革命性動員的集結點，因此勞工在執政黨有效的統合政策之下，是完全沒有政治力量的，他們只能在選舉時用選票表現出對當前勞動關係與勞動條件的不滿。從這個角度來看，一九八六年底的選舉，執政黨在工人團體民意代表選舉中前所未見的挫折，就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了。

爲了使臺灣的經濟發展維持高度成長，必須維持低廉的工資與穩定的工業秩序。雖然這主要是透過戒嚴令抑制了勞工的爭議權，以及一些社會結構因素所導致，但解嚴後重新恢復了勞工的罷工權，且以往對系統維持（system maintenance）有利的因素也改變了。

首先，由於開發中國家一向是透過非正式部門（如攤販、地攤、路邊洗車）的廉價服務，而使正式部門的僱員勉強可維持生計，而得以忍受微薄的薪資，因此非正式部門的存在，爲資本案

消解了加薪的壓力。然而由於薪資水平的調整常小於物價水平與消費期望水平的增加，因此薪資結構上的緊張，必然在未來愈加擴大。

其次，從人口學特徵來看，以往年輕勞工一直是勞動市場中的主力，由於年輕勞工尚不需負擔家計，因此如果大量雇用年輕勞工，薪資水準就不需達到維生的層次，而可停留在補貼層次上。由於本省人口的生育率高峯是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七年之間，從此以後生育率便開始下降。而生育率高峯期以後出生的人口，正逐漸要成為勞動力市場的生力軍，因此勞動力老化與短缺的現象，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現象，首先將出現於年輕勞動人口為主的行業，以及技術層次較低的體力性行業（如營建業）。年輕人口減少，會導致薪資上的要求增加，同時對於勞資之間的關係產生改變。

蓋慈（Hill Gates）與戴蒙（Norma Diamond）在對臺灣女工的研究中分別指出，臺灣的女工是把工作當成學校與婚姻之間的過渡階段，一旦結婚就退出工廠。由於工作只具備過渡性質，因此女工一般較保守，不會冒失去工作的危險，參加政府禁止的活動。然而隨著雙元事業家庭逐漸普及，女性工作人員日漸轉而視工廠工作為終身職業，其薪資與福利的要求也就與時推移了。

情境性條件轉向意向性條件

年輕勞工在進入工廠之前，已被家庭、學校社會化為權威取向的人格。孔小玲（Lydia Kung）指出臺灣的勞工與領班之間存在着特殊的垂直關係，而非水平關係。勞工認為領班是資方的代表，其主要工作是維持紀律與達成工作要求。這種權威取向的人格，對工廠的人事管理有利。然而任勞任怨，只希望維持待遇較

好的工作之第一代勞工已漸漸退休。勞工職業滿足感逐漸由情境性條件 (situational) 轉變為意向性條件 (dispositional) , 即由外在的報酬與工作安全的需求擴及內在的個人的態度與自我滿足。勞動市場中的主力, 逐漸轉變為對職業有更高要求與期望的第二代勞工, 他們對自己應享有的權益也較清楚。伴隨着勞動基準法的實施, 當勞工為本身權益進行抗爭時, 會更加覺得有法律上的依據。

廉價的勞動薪資, 使勞工並不以自己身為勞工為榮, 大多數勞工都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 這固然與白領勞工增加有關, 也與家族成員之間的認同有關, 親屬中很可能有自營業主或中產階級, 而導致勞工意識不彰。但一九八六年底工人團體民意代表選舉的戲劇性結果, 使得勞工自覺他們有力量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權益, 執政黨開始警覺到勞工問題的迫切性, 各政治團體也開始認清勞工是一資源豐富的場域, 亟待進一步開發與經營。

為因應轉變中的勞資關係, 執政黨於八月二十六日提出了「現階段勞工政策綱要」, 強調維護勞工福利, 希望在勞工福利受到保障與增進的情況下, 勞工權利可獲得滿足, 使勞工不必逕行行使三權來爭取權益。執政黨將研議中的行政院勞工署提升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十一月十九日行政院組織法研修小組初步決議將勞工委員會提升為勞工部。執政黨的因應措施, 基本上是提升勞工行政組織的層次, 以擴大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的權責, 這反映出了國家機器急於直接處理勞工事務。勞委會的議事運作, 並不能超出行政預先擬定的範圍。勞委會在有責無權的情況之下, 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 反而易使勞工捨資方而將國家機器視為抗爭的對象。此外, 委員會由各種背景人士所組成, 反而易形成本位主義, 使委員會議事偏向於自我利益的爭取, 而非法理上的討論。

一九八六年底民進黨籍候選人王聰松意外當選後，民進黨中央也開始試圖開發勞工領域。此外，民進黨中的邊陲派系，也企圖在地方派系基礎上，開拓出一條新的政治動員路線：二月中旬時省議員王兆釧、莊姬美、林宗男、北市議員周伯倫正式成立「臺灣勞工團結聯盟」，省議員吳大清也宣布成立「高雄勞工聯盟」，這是繼王兆釧「北縣勞工聯盟」、莊姬美「新竹農工聯盟」後的第三個同性質的勞工組織。儘管周伯倫後來公開否認將另立門戶，且各地勞工聯盟未得與新興的勞工政黨結合，但勞工問題的具體化以及勞工政治資源的誘惑，終將造成既存黨派的分裂，不論是現在或將來。在民進黨二全大會前夕，「新潮流」系將自組社會黨的傳言時有所聞；民進黨外圍「勞工法律支援會」與工黨建黨小組成員間的關係曖昧不明；民進黨中的夏潮聯誼會成員與之更是藕斷絲連。未來決定異議人士支持民進黨或工黨，則端視「臺灣人意識」與保障勞工的人道理念，何者的價值位階較高而定。

「勞動人權宣言」的出現

五一勞動節前夕，三十多位學者及民意代表，共同發表由臺大張曉春教授起草的「勞動人權宣言」，主張確保最低薪資，照顧退休生活，不得濫施加班；解僱應有法律依據；勞動者全體投保，健全福利制度，工作生命保障，工會自主及恢復罷工權。簽署名單中除了工人團體民意代表及立委王義雄之外，民進黨籍區域性民意代表並未得以簽署，似乎說明了關心勞工權益、熱心勞工運動的知識分子開始試圖結合各界，成立屬於勞工的獨立反對政黨。

一九八七年勞工運動的勃興，並不能只以所謂民間社會理論

(civil society theory)，單純視之為人民民主抗爭的一環，這點可以從去年工運的擴張基本上並非由民進黨所主導，而獲得證實。儘管如此，勞工運動受到各種新興社會運動的自力救濟抗爭之示範效果所影響，卻無庸置疑。一九八六年十月「臺北市計程車司機聯誼會」所屬司機，為計程車靠行問題及成立新工會，先後數次前往立法院、交通部及市政府請願。一九八七年二月份，國營單位中虧損最多的中船公司，經幾度裁員減薪後，導致員工不滿，中船公司產業工會三十五名代表發起罷免理事長。七月份時，員工對加薪幅度表示不滿，發起簽名，要求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此外，由基隆港、高雄港碼頭工人組成的輪船理貨工會，八月中旬向勞委會申請罷工，以爭取較高的勞動條件。

臺灣省總工會在十月間針對南區六十四名、北區七十九名工會幹部舉辦民意調查指出，贊成勞工應擁有罷工權者，北區佔八五%，南區佔九十%。贊成必要時得進行罷工者，北區佔八十%，南區佔八七%。至於如何進行罷工，北區了解的寥寥無幾，南區則有四十四%代表自以為了解。此外，依據勞委會的統計，在七至九月中，臺灣地區共發生三百四十六件勞資爭議案件，雖較四至六月減少九十五件，但參與爭議人數則自二千三百六十三人增加到三千七百三十一人。勞資爭議雖減少，但參與人數卻激增，顯示勞工的團體意識已增高了。

工會意識已不同往昔

工人的團體意識雖已增高，但勞工仍需要有制度性的機構才能發揮力量，目前國內共有一千二百十七個產業工會，共有會員四十七萬八千四百人，入會率約十二%，就產業工會入會率而言，遠低於歐美。勞工未加入工會的原因，由於廠內並無工會組織